

平暴后的反思

坚持改革开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唐绍明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平暴后的反思

——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唐绍明 主编

李明三 副主编

刘春建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古 月

封面设计：丁 品

平暴后的反思

唐绍明 李明三 刘春建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09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88-5/D·42 定价：3.20元

76151

目 录

前言.....	1
北京市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	袁立本 3
新闻自由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强华 34
动乱后的反思.....	王茂根 60
扭转精神世界的滑坡.....	曲 啸 79
加强廉政建设,巩固人民政权.....	彭吉龙 87
民主政治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	陈登才 112
关于民主问题的几点思考.....	阎长贵 李明三 徐建一 143
科学对待中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刘春建 165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	张蔚萍 201
贯彻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	吴光辉 217
现实政治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潘荣庭 241
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张启华 259
当前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	刘效牛 283

前 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深刻反思的书。风波虽已平息，人们特别是青年思想上的一些“扣子”已经或正在解开。但是对这场严重政治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决非短期间能够完全解决的。有些问题，特别是涉及深层次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还需要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进一步解决好，真正树立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牢固观念。为了和广大读者共同来思考，本书大体上从三方面编了一批文章：

1. 对动乱事实真相的了解。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帮助人们了解动乱发生的前因、过程、后果以及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2. 针对人们，尤其是青年中对现实一些具体问题的困惑，如腐败问题，自由、民主问题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3. 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宏观方面的问题，如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中西文化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等问题，作了相应的研究和探讨。

本书编写时，力求贯穿一个基本要求，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来回答当前一些现实思想问题，用具体

的实际材料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既非单纯的追求理论的高深，也非简单的材料的堆积，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紧紧结合起来，用正确的观点，翔实材料，平易的语言，服务于广大读者。

最近一个时期，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当前学习形势很好。广大党员、干部、青年的学习热情正在兴起。我们愿献上这本书，作为一个小小的学习辅导材料，帮助党员、干部、青年学习理论，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学习高潮的到来。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11月15日

北京市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

北京市委 袁立本

本文介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由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一些情况。其实，陈希同同志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性质都讲的很清楚了。这里仅就具体情况和当前社会上反映较多的一些问题，以及笔者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作一个介绍。

一、暴乱的性质。要搞清这场暴乱的性质，首先有几个大的前提应该搞清楚。不然，对有些具体细节、甚至有些具体事情的真相也很难搞明白。我看有三个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我国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搞清事实真相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有些人的想法，认为我国当前的状况，不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从学潮到动乱以至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合理的、革命的。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动的，那么，学生的行动当然就是进步的、革命的，甚至是民主爱国运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形成的，

是我们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客观的国情所决定的。所谓民主救国、走西方道路，应该说从满清末期就开始有人在搞了。也提出过“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等等口号，幻想靠引进西方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来救中国。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在论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后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在我国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只能作为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反动阶级，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所形成的。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当然，也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思想理论武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口号。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这个现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通过这次动乱、反革命暴乱，活生生的事实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所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采取的手段、所使用的方式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他们的所谓民主、自由，包括新闻界一些人高喊的“新闻自由”、“讲真话”，到底是什么货色？这个问题应该搞清楚。从现象上看，这次学潮是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的，他们提出的最关键的两点：一是重新评价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对于

耀邦同志的一生，党中央的讣告有很明确的结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所谓重新评价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耀邦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是不得力的，“重新评价”的实质，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态度是正确的。二是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中“受迫害”的公民平反。这里有一段插曲。第二点中原文是“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李淑娴说，这样提不好，容易得罪群众，失去群众，因而将“知识分子”改成“公民”。这两点的实质就在于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

前几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的新闻报道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曾经喧嚣一时，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的报道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压制。也就是说，共产党的舆论工具不为共产党说话。正象有些新闻界人士所说的，他们“不愿做喉舌，愿做大脑”。这样，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理论一概被斥之为“左”的思想、僵化的思想，扣上这样那样的大帽子。有一件事大家还记忆犹新。赵紫阳对《河殤》这个电视片很支持，在他的责成下，复制了许多拷贝，在国内外发行。但是，国内批判《河殤》的文章却不允许发表。平暴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河殤》到底宣扬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1988年10月份写的。在那个时候，大概由于李政道的名声，在《人民日报》才登了一篇他对《河殤》的看法。那大概是仅有的几篇批判《河殤》的文章之一。也就是说，整个舆论工具为这些所谓“精英”，即长期坚持自由化的一些知识分子所控制。大家知道，在对农村

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上，北京市与《人民日报》有一场争论。当时，北京顺义县还有其它县搞规模经营，这很符合北京市郊区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一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有较高的收益，另一部分人从事队办企业生产。这是农业发展的一条道路。如果大家都在小块土地上经营，完全靠在土地上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收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全国很快就出现了弃农经商、务工，造成农业在某种程度萎缩的现象。然而，一些“理论家”不顾这些现实，一味地要求我们的农业不加区别地都承包到个人。事实说明，北京市农业近两年由于坚持结合自己的实际推行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形势非常好。1989年在动乱到暴乱期间，北京市夏粮依然取得了大丰收，大约比去年增产9%。但是，当时的《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抓住一点枝节，抓住个别人反映的一些个别情绪问题，否定北京市的规模经营，目的就在于宣扬他们的私有制，宣扬他们的个体经营。我们曾经请赵紫阳同志到北京参观一些农村企业，请他参观农村集体的或全民的养鸡场。他没有去，反而只去看个体养鸡户。其实，北京有些个体养鸡户也是在集体的扶植下才搞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新闻自由就是允许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在这场动乱、暴乱中他们就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煽动一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学生，再加上国际上的大气候，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发泄不满。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赞成赵紫阳所坚持的一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对赵紫阳同志支持和纵容动乱，以及赵紫阳同志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都有明确的阐述。如果按照赵紫阳的主张搞下去，那就是全盘西化。香港新闻界所造的

大量舆论，很说明这个问题。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治理整顿方针以后，国外一些很敏感的记者感到这对赵紫阳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香港报纸很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充分地按赵紫阳的路子走，这就是说必须充分地授权给赵紫阳。当时一些反动的舆论发动了一场“倒邓保赵”的运动。特别是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同这种“倒邓保赵”互相配合。因为他们感到赵紫阳的主张，是符合国际大气候的，是符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势力的政治要求的，也是符合各界反共人士在我们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总的战略要求的。这两年，大家都有体会，我们党的领导作用是在一片加强声中一步步削弱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越来越削弱，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干部队伍也越来越削弱、涣散。《人民日报》曾经登过一篇文章，讲什么政工干部减一半，生产翻一番的经验。这两年造成群众中的思想混乱，造成党员的思想混乱，也造成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混乱，感到对有些问题无所适从。赵紫阳在中央各省的副书记会上谈党的建设问题时，开场白就说，今天，我是赶着鸭子上架。而且，这个讲话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时，也是这句话。所以，我们这些搞党的工作的同志感到寒心。当时我们对赵紫阳同志所犯的错误的性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只是觉得，如果我们的总书记讲党的建设都是赶着鸭子上架的，那么，我们党还由谁来讲党的建设呢？所以，从各个方面涣散了我们党的组织战斗力，涣散了整个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首先要把这三个大前提搞清楚，就可以从本质上认识这场风波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不然，我们就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到现在为止，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不是所有

的人在这些问题上都完全有了正确的认识，或多或少都有些转不过弯的地方，还有些糊涂观念，甚至有些人到现在为止还认为，不出几个月或几年，可能这个案还会翻过来。如果作为一般群众这样认识问题，只是个教育问题。作为党员，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仍坚持这种看法，就是非常错误的。在群众中有不同的意见是允许的，只要不付诸行动。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则不允许这种明显的不同的意见存在。看法可以有，但是，涉及基本的原则问题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有些人，还感到有些问题不够理解，比如说，部队为什么非进城不可？党和政府如果那时候早些出来做工作，对同学做些让步，早些采取其它办法，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天安门广场到底开枪没开枪？天安门到底死人没死人？到底是群众先烧的军车还是部队先开的枪等等。那就要进一步做好工作。但是我想对这些问题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非常清楚了。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些同志在初期可能由于对真相不太了解，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有些党员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对有些问题也很少动脑筋认真分析。因此，可能刚开始稀里糊涂地跟着谣言转，跟着一面倒的舆论转，介入过深。现在事情真相大白了，从感情上还很难一下扭转过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希望这些同志从大局出发，从党性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认真分析一下整个事件过程，这样是不难把问题的性质搞清楚的。

二、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由学潮到动乱最后到反革命暴乱的必然性。这场学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削弱了党的领导，涣散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口

号的煽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竞相泛滥。一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越来越胆大，越来越猖狂，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方励之有过一段讲话，认为共产党40年来什么好事也没干，这种论调可以随便发表。北京大学里的所谓“民主沙龙”，可以任意请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学校里腐蚀我们的学生。当时，他们酝酿在1989年利用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庆40周年的时机，掀起一次“民主爱国运动”的高潮。方励之曾经给一些学者、教授讲过话，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些训示，希望他们胆子更大些。他讲如果这样的会再开两三次，学生就可以上街了。1989年2月份，一个叫张显扬的（原来是文革中的“三种人”，被清除出党了）跟王丹讲，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情况，中国还要经过几次教训，其中包括动乱。所以，方励之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就提出过动乱这个词。他们就是要搞一个大的所谓民主爱国运动，要通过动乱这种形式，搞民主运动。学潮一开始，很多人的讲话充分说明这一点。李淑娴为这场动乱安排了四步：

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要为胡耀邦平反，“这样，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从4月15日到4月22日胡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这一期间，中央对学生中的一些过激言行，甚至一些过格的言行，也就是反动言行，都采取克制态度。4月15日到4月22日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游行。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只是出面维持秩序。每天，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交通都要堵塞。从他们思想感情上来讲，把政府叫做“当局”，根本没有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对党和政府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失误，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也就是说，没有共同出发点。再有，群众最恨腐

败，所以，有些人，也有些好心的同志讲，学生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有什么不对？我们党和政府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为什么不能接受他们这些口号呢？绝大多数人主观愿望不是好的吗？其实，正象小平同志讲的，“那些别有用心的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有人把李淑娴以这种口气说的话，还认为是学生中正当的要求，唯一的要求，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对党员和有些干部来讲，那就太糊涂了。

第二步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王丹在4月19日凌晨冲击了新华门以后，就曾说过，“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气极了，一动手，我们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谣言都是借这个题目发挥出来的原因。什么“4·20惨案”，“天安门血流成河”，“一千多名知识分子被打倒，躺在长安街上”，“武警的警车故意压死学生”，6月4日凌晨清场时“血染天安门”，包括肖斌生动的表演。为什么都在这上面造谣？李淑娴和王丹的言论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

第三步就是要求参加追悼会。这样，事态就扩大，就能推向全国，他们几千名学生要求全部参加追悼会，不答应要求就是政府不理，就可以引起全国各地的学生的同情。

最后一步，是5月4日达到最高潮。

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可能大多数学生刚开始不太了解这些背景，出于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上的失误，特别是对少数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腐败官倒的义愤，借助于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发泄不满。但是，很快地这个学潮

就纳入了少数幕后策划者的轨道。当然，有些同志可能还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学生会卷入？对当前我们学生的思想状况应如何分析？如果到目前有些人包括一些学生，还强调既然这么多人会卷入，就说明了这场运动是民主爱国的、是反映大众意愿的，那么，我们要问当最后游行中出现了那么多“打倒邓小平”，打倒除了赵紫阳以外所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政军领导的时候，打倒现政府的时候，那些学生，那些反腐败、反官倒的党员干部们为什么不出来抵制？最起码可以不参加游行吧。应该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一些学生的思想糊涂，做出这种事情不足为奇。如果有些学生不承认自己上当受骗，认为自己还很高明，那么，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同意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意打倒邓小平、李鹏，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所谓高明，只能说明一些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

这场动乱是有预谋的，是有组织的。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只是一个机会。他们把这场蓄谋已久的动乱提前了。胡耀邦同志一去世，就谣言四起。胡耀邦同志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然发作的，当时只是李铁映同志在汇报教育改革的情况，还没有任何别的发言。可是却谣传什么胡耀邦同志是被气死的。胡耀邦同志是4月8日生病，4月15日早晨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的。当天，各大专院校就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和挽联，这天的挽联还有不少是悼念性质的。4月16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些大字报的语言就很恶毒了，什么“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等等。这时候，悼念的只占20—30%。到4月17日悼念的内容就更少了。政治温度上升得非常快。他们每天到天安门游行，提出一些政治要求。4月18日三位人大代表，宋世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

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接下了学生代表提出的七条要求。王丹当时也讲，如果接了我们的请愿书，能够递交给人大，我们就撤回去。这个时候，王丹给李淑娴打了个电话，李淑娴说，决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所以，有人讲，如果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是不是事情就停止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4月18日晚，就有人开始鼓动学生到新华门去，他们说，这么大的广场，你们每天到广场上坐着，政府根本不理你们。所以4月19日凌晨出现了第一次冲击新华门，凌晨3点钟，公安干警出动，依法驱散了人群，制止了他们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从4月19日晚上到4月20日凌晨，出现了第二次围堵新华门。这次规模比头一次更大，处理起来也更加困难。武警战士手拉手和同学们面对面，往两侧一步步移动，大约将近三个小时，才把新华门前几千人的队伍挤散。最后，新华门前还有二三百人静坐，一直劝到早晨5点，他们仍然不撤，只好由公安干警把他们强行带上公共汽车，送回北大。这以后就出现了所谓4月20日惨案的说法，这当然纯粹是谣言。在4月29日对话时，我已经讲了，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是依法履行他们职责的，而学生是违法的，违反了北京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冲击了中央的重要机关，干扰了中央机关的正常工作，阻碍了交通。而且有少数学生、一部分歹徒向警察身上扔石头、汽水瓶子。如果说是4·20惨案，那么这惨案就是学生和一部分歹徒打了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当然，后来有些武警和少数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这在当时情况下是难免的。但是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打死了多少人，那天一个人没抓，一个人没死。在把这200多名学生强行带进汽车时，有个女同学在车上喊“打倒共产党”。我在和学生对话（和袁木等同志一起

同学生对话)时,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在场。这个人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第一个自首的。他是高自联第一任头头。4月20日凌晨,他是在新华门现场的,我和他进行了谈话,劝他们退出,他把我的话转达给了静坐的同学,但是静坐的同学不答应。后来,我们强行把这200人带上车时,他溜到边上,我过去问他,这么晚了你怎么走。他说不要紧,天快亮了,可以坐头班车。他回校后也说,实际情况不是像传说的那样,确实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4·20这个事件,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大造谣言,以达到李淑娴所说的激起同学的愤怒。李淑娴是很讲心理学的,她说把警察激怒,动手打人,女同学富有同情心就要哭,男同学有男子汉气概,他们就要出面保护女同学。这样,同学们就都会激昂,就会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看来他们就是一步步按李淑娴说的去干的。当然,背后还有更高的人在操纵。一个被一辆105路电车撞死的北师大学生,她本来是去看演出的,由于被汽车中部卷进去给轧死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交通事故。可是,有的外校学生对北师大学生讲,你们真是傻帽,你们就说是武警压死的谁知道,搞乱了再说。所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到了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时,他们更是百般刁难,又造谣说政府不理、李鹏不出来接见等等。我在4·22对话中,当面问了郭海峰,我说如果我讲的不符合情况,你当场站出来澄清,郭海峰和周勇军谁也没说出不同意见。追悼会时曾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同学能够自动维持秩序,胡耀邦同志的灵柩可以从广场上通过。但是,他们的代表说:“我们的要求不答复,其它要求都无所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相信他们。所以,灵车只好从大会堂的西南门走。至于说三个人下跪,这也是他